



## 从世界文化的角度 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张西平

**摘要:** 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论证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本身考察,而是将中国文化特质放在世界文明的广阔空间加以分析。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化曾经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文化的形成,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现代生活内在统一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在世界文明范围内,中华文化是最早从宗教形态转型为世俗形态的文化,从而系统回答了人离开神后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中华文化的世俗性特质也使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赋予了中华文化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 世俗性 宗教 儒家 包容性

长期以来我们只是从自身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但这样的视角很容易从历史的线性发展来看待自己的文化,用一个时间发展的维度来看待自己的历史。显然,这样的视角是不全面的。看待自己的文化还有另一个视角,即从外部来看,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化,在一个横向比较中,而不是在一个自身线性发展中来考察自己的传统文化。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其多重的价值,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都是极有价值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曾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这说明儒家文化并不是与现代文化完全对立的文化。

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表现在18世纪的中国热。“启蒙时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花卉和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sup>①</sup>

<sup>①</sup>[英]S. A. M. 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75~276页。Berger, Willy R., *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ärung*, Cologne: Böhlau, 1990. Chen Shouyi, *The Chinese Garde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ien Hsia Monthly* 2, 1936, pp. 321-339; repr. in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 Press, 1998, pp. 339-357.

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故事作为一种风尚。Chinoiserie 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这“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喜爱来自中国的事物”。<sup>①</sup>

伏尔泰的书房名为“孔庙”，发表文章的笔名是“孔庙大主持”。为何对儒家这样高的评价呢？

中国的自然历史观高于欧洲的宗教历史观。

中国文化的存在，儒家文化的存在，说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基督教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谎言被打破。

历史充满了复杂性。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在欧洲的影响也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学术界在理解启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大都不注意启蒙运动真实历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多元复杂关系，从而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关系不能做出学理与历史的综合性分析与解释。

通过弘扬启蒙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种看法。这种思维实际上接受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加之缺乏比较文化的立场和对全球化史研究进展的关注，因而，完全不知中国文化在 1500—1800 年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关系和状态，不知当时中国在全球化初期的地位。所以，当弗兰克说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学者极为震惊。这种看法自然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何被启蒙思想所接受、所赞扬。在他们赞扬启蒙之时，内心已经将中国文化作为启蒙思想的对立面，而完全不知中国文化恰恰曾是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源泉之一，也无法理解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具有现代思想的内涵，只要经过创造性转换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学者并未真正理解启蒙运动。历史的吊诡在于，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对启蒙的崇拜和信仰有其合理性，就是到今天启蒙精神仍有其文化和思想价值，因为启蒙运动留给人类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仍有其重要的价值。将这些启蒙精神和中国传统思想完全对立起来是对启蒙思想形成历史的不了解。同时，对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科学”“理性”“进步”的一味赞扬，说明这样的看法不了解启蒙思想家在形成这些观念时的缺失，尤其启蒙思想后期形成的“进步”观念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从而缺乏对启蒙的反思，特别是对西方近百年来在启蒙思想影响下所走过的实际历史过程的反思。<sup>②</sup>

启蒙思想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看起来似乎有些对立，可是一旦我们进入实际的历史境遇，就会看到将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立起来的认识是值得反思的。

<sup>①</sup>许明龙《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1 页；严建强著《18 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sup>②</sup>“人本主义在上世纪(19 世纪)末叶达到顶峰。帝国主义的欧洲统治全球，但文化的欧洲则相信这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和包庇了一场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惟一的文化其实只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枝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曾居然认为有权蔑视其他文化并予以毁灭’。”[法]莫兰著、齐小曼译《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7 页。[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郭英剑校订：《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当下中国学术与思想界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精神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清理“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之时，思想的创造与独立，本土资源的发掘和清理百年的西方中心主义成为我们绕不过的一个重大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的启蒙已经瓦解，思想已经分野，哪种思想方案更适合崛起的中国，这要等待历史回答。参阅许纪霖、罗岗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版。

从我们上面所介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来看，儒家思想和启蒙思想并不是对立的，儒家思想曾是滋润启蒙思想的重要外部资源，它与启蒙精神相连，但又有别于西方启蒙思想。因此，在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时，我们不能完全将儒家思想和启蒙思想对立起来，而是可以从启蒙思想家当年对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理解中，纠正其偏误，赋予儒家文化符合现代生活的新意，开创启蒙思想之新意。

例如，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来解构中世纪的宗教，这说明儒家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启蒙思想家在理解儒家的理性精神时并不全面，启蒙思想所确立的理性最终演化为工具理性主义。这样他们并未深刻理解儒家思想的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融合，儒家思想的半哲学和半宗教特点。儒家的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工具理性之间有着契合与差别，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持启蒙理性精神的同时，发挥儒家理性与神圣性合一、人文理性主义的优势，克服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之不足。同时，如何学习启蒙精神，将儒家实用理性转化为不同于工具理性的现代理性，这都给我们留下宽阔的学术空间。

又如，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富足的世俗生活，赞扬了个人主义。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压制个人的专制文化是说不过去的，即便在孟德斯鸠那里，他对中国的专制文化也做了特别的处理，而无奈专制主义并非在批评意义上的使用，如克拉克所说：“必须记住，启蒙思想家口中的‘专制’绝非批评之辞，在这里中国乃是被视为受开明统治治理的国家典范，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会根据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作出决定，它将视法律而定，它将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为目的，它将以社会一切方面的和谐运转作为统治者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中国视为理想社会，它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范本。”<sup>①</sup>

但中国文化中对个人的肯定又不同于启蒙所开启的物质主义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凡俗的个人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儒家的人文主义正如陈荣捷教授在《中国哲学资料选》中指出的：“如果有一个词能够概括整部中国哲学史，这个词会是人文主义，不是那种否认或淡化至上力量的人文主义，而是承认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主导着中国思想的历史。”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既不是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世俗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后来由此演化的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孔多塞等后期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进步”观念也有其合理性，进步总是比落后要好。但这种进步不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进步观，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无限索取自然的进步观，不是以西方文化取代其他多元文化的进步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都可以作为修正孔多塞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进步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目前关于启蒙思想与中国思想的讨论大都是在纯粹理论范围内展开的，但思想是历史的思想，没有历史的思想永远无法高飞。历史是智慧的源泉，只有在一个长期的历史中，我们才会体悟到真理。通过我们对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启蒙时期的传播和影响研究，我们可以从根源上对启蒙做更为全面的反思，从而走出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立的思考模式，克服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片面批判和固守在启蒙思想内部发展思想的两种倾向，从中国的历

<sup>①</sup>克拉克 《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史和启蒙的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将历史重新激活，将中西思想重新融合。<sup>①</sup>

## 二

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世俗性文化，它回答了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精神的安放问题。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日益脱魅，走向世俗化世界的过程，上帝死后，如何生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回到了这一点。

最早提出中国文化在殷周发生变化的是王国维，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人之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sup>②</sup>“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sup>③</sup>

王国维所说的旧文化灭，新文化生，就是中国文化在殷周之际发生重大的转折，虽然在周人那里天仍具有神一样的意志，尚达不到后来的“然命定论或者宇宙命运论”，但正如学者所说：“在从殷商文化到周代文化的发展中，从思想上看，殷人的自然宗教信仰虽然通过祭祀制度仍容纳于周代文化中，但是周人的总体信仰已超越自然宗教阶段，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与宗教学上所说的伦理宗教相当，即把伦理性格赋予‘天’而成为‘天意’或‘天命’的确定内涵。同时，天与帝的不同在于，它既可以是超越的神格，又总是同时代表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存在和覆盖万物的宇宙秩序，随着神格信仰的淡化，天的理解就有可能向自然和秩序方面偏移。”<sup>④</sup>

中国学术界所有这些认识都是在王国维以后，在安阳小屯甲骨文发现后，才逐步明晰起来的。

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思想这种由巫到礼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由巫到礼’，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第二步是‘释礼归仁’，孔子为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出内在人性根源，开创了‘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性文化，人与神的问题是世界各个民族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宏观的历史来看，宗教是会永远伴随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但走出神的世界，生活的世俗化是整个人类生活发展的总体趋势。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化是较早解决这个问题的文化。2017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新教伦理就是要回答伦理与宗教生活的问题，尽管基督新教的神和世俗生活大大拉近了距离，但神仍在，并未彻底回答如何处理神和世俗生活的矛盾问题，这才有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 三

由于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世俗性文化，不是一个严格的宗教性文化，这样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存在，宗教宽容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sup>①</sup>许纪霖、罗岗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sup>②</sup>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99年版。

<sup>③</sup>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99年版。

<sup>④</sup>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页。

儒家文化有宗教性而非严格的一神论宗教，这样其贡献在于回答了离开神后的精神安放问题，不足在于无法满足人们一定的宗教需求。这样儒家文化对其他宗教的传入基本上是能接受的，佛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基督教传入中国，基本上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都能妥善处置。同时，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内部充满了多元性。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处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西方在全球扩张中对其他宗教文化都采取了排斥的方法。今天，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宽容地对待其他宗教文化的问题。面临这样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文化给予了智慧，和而不同，宽容相待，文明互鉴。这样的态度是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智慧。

## Rethink th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Culture

Zhang Xip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 on th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a simpl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tself, but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broad scope of world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ha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an culture, indicating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unity with modern life. This trait i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is the earliest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ligion form to secular form of culture, which systematically answers a series of major issues such as how to place one's own soul after people leave God.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ular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also makes it extremely inclusive. It is this inclusiveness that has given the Chinese culture a lasting vitality.

**Keywords:** Secular; Religion; Confucianism; Inclusiveness

---

作者简介：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主要研究国际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汉语国际传播。